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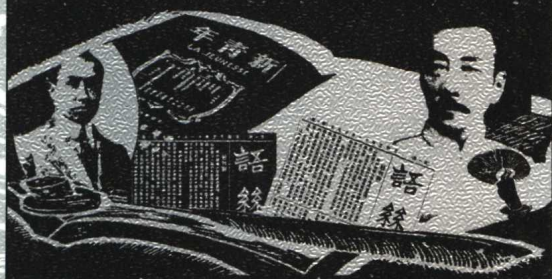


猫头鹰学术文丛



陈方竞 著

多重对话：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头鹰学术文丛



多重对话：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陈方竞 著

05
10
13

206.6/39



0763021

~25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陈方竞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7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4173-6

I. 多… II. 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091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段志坚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Duochong Duihua: Zhongguo Xinwenxue De Fasheng

陈方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3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02-004173-6/B·264

定价: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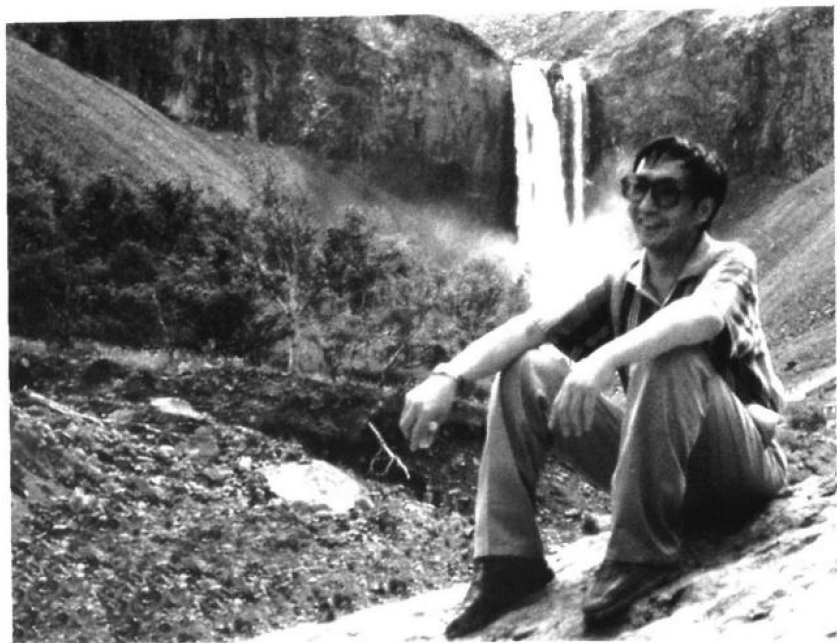
学术顾问

王乾坤	王富仁	邓晓芒
周国平	耿云志	钱理群
黄克剑	葛剑雄	

策 划

王培元 高贤均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方竞，浙江海宁硖石人，1948年出生在上海，曾在香港、天津、太原、北京生活过，在吉林经历“文革”，后上山下乡，当过中学语文教员，1977年参加高考，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始终在高校任教。现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能体现二十年来研究路向的著述有：《五四退潮后苦闷期文学及其外来影响》（1982），《试论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1984），《柔石的〈二月〉解析》（1986），《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深层联系探寻》（1988），《鲁迅对浙东民间文化的感性体悟》（1991），《关于蒋光慈〈丽莎的哀怨〉的重新评价》（1993），《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思考》（1994），《穆木天传略》（1997），《鲁迅与浙东文化》（1999），《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1999）等。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自序

8月20日下午3时许，我突然接到远在北京的王培元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了本书的出版，他高度评价了本书——现在学术著作一般的写作方式是先有了出版合同才动笔的，虽然也有订了合同写出后仍然被束之高阁的；本书则完全相反，像在“打水漂”，有可能“石沉大海”。由此是可以理解我接到电话时的激动的——这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写得最艰难的一本书了。

书是1996年底就定下要写的，是刘中树先生为负责人的一个国家项目。记得论证项目时刘柏青先生写来意见，他的期待像一盆火，至今余热尚在。他与我面谈时以“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喻，以一种“悲凉感”寄希望于我们。但事情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顺利：作为课题的具体承担者，1997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定稿和具体指导一位韩国学者完成近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与人类文化母题》，次年又接受并完成了鲁迅的两部杂文集的注释、校勘。此外，作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在女儿“放飞”的同

时，近几年又与妻子共同承担了双方年过八旬的老人晚年的生活赡养和用费昂贵的疾病治疗，他们都是为共和国事业奉献毕生精力又历经磨难的人，国家有“困难”使他们难以安度晚年，我们作为子女，又是共和国同龄人，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都影响了本书的完成时间，但并不构成本书写作的困境。

困境来自现实，这是与近年来我明显感觉到的学术环境的逐步恶化相关的。我认为，学术研究具有民间性质，这是它保持创造活力的根源，我们所在的体制正是因为承认并支持这一性质，才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近年来的变化有外在的原因，同时也与学界本身相关。经历了经济大潮冲击“挺”过来的学术界，出现了将学术商品化，可以通过剽窃（即鲁迅言及的30年代所谓“剪贴”）或炒作（即类似于鲁迅在《序的解放》中说的“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使其增“值”的现象；更主要的是，一些人发现在商海中得不到的东西，转而可以在“体制”中轻而易举地获取——使自己成为体制认可的学术代言人，再搞出一套所谓体制的学术标准，目的是把学术研究体制化。我见到过一些所谓“学者”，亮出名片竟有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吓人的头衔。我就想，他有这么多正在“热”的行当要干，怎么可能再去坐“冷”板凳搞学术？问题主要在于由此带来的学术环境的恶化，即以政府设立的各种评聘、奖励为例，这本是体制支持民间性学术研究的措施，但学术体制化者则把这蜕变为一种“权力象征”、一种“利益分配”、一种“关系平衡”、一种“商品交换”，不仅由此可以进一步使自己增“值”，而且从根本上扼杀了学术研究的民间性质。你可以不在

乎这些，我的一个朋友就把这视为“黑色幽默”。但我以为这是苦味的，因为我们身在体制中，不可能超脱于现实，包括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且，研究鲁迅就不可能心如止水，不可能不由此而愤怒、而感到学术研究的局限，甚至有些无聊以至荒诞感。

本书写作的主要困境还在学术研究本身。记得1994年西安年会上听樊骏先生讲《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时怦然心跳。今天看来，这应该有两方面指向：一方面是近年来学界明显地感到我们这门学科的硕士包括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在下滑，就我实际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要更严重一些。这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腐败之风钻体制空隙的原因；但为什么外国、古典等研究历史较长的“传统学科”的情况要比现当代好一些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门学科还显得“年轻”，学科性不强，需要“成熟”起来。另一方面，我认为前述问题的出现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关，我们自身即忽视学科建设。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曲折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良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规范；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但我们往往过于急功近利，急于把自己已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变成“一统天下”。胡适1922年写出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具开拓性，但我们对它之于学科建设的负面意义的认识仍显不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觉，1985年的“方法论”热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多少有些相像，即都是紧随一场以“立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之后，提出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科学，表现出相一致的科学主义倾向。至今我们仍缺乏对这一科学主义倾向的反思。我认为这

一倾向对我们这一学科的侵害要大于那些传统学科，这仍然与学科自身特点不强有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正像作者之一钱理群后来对此反思所说的：对我而言“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的，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这正是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白话文学史》的思路。钱理群当然没有按照这一思路去深化自己的研究，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他无法改变的，加之“方法论”热之流弊，在近十余年的学科发展中形成这样一种研究偏向：满足并局限于有限的文学史料（不愿也不屑于去做对史料的发掘、考证、鉴别这类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引进并借助于与研究对象貌似契合的所谓理论与方法去进行意义翻“新”的研究，主张“强化理论意识，突破实证研究”，“把‘事实’的证明变为‘意义’的阐释，把史料价值提升为思想价值”，由于其说法新颖，为编辑喜好，于是那些无视以至背离“史实”而横扫20世纪的鸿篇大论汹汹而来。一方面由于其泛滥而使学科研究变得简单易行；我就读过一篇批评“自以为是”的“文学史”的文章，通篇没有一条注释，也没有例证，用大而无当的所谓“理论”把近年来“重写”的“古典”以至“现当代”文学史统统否定。另一方面，给这门并不“成熟”的学科塞进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模式”，又在窒息着学科发展；因为“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是

灰色的”。这应该是我们这门学科研究发生危机转而寻找“学术生长点”的原因之一吧。

本书的写作是与此相悖的，或者说多少有些针对于此而展开的。这对于曾经也受到“方法论”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方面的大论影响的我，是艰难的。我认为，作为文学史研究，研究者提出的“回到现场，触摸历史”，目的是为了发掘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而为我们的“文学史”既有描述所忽略的甚至曲解的资源；它是“当年”的实际存在，触及历史症结，因而自然蕴含着“历史感”与“现实感”。对此的发掘，当然不能靠理论，也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搜寻、考证，在我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立足于“感觉”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本书所做的文学史描述，其深层动因（并始终伴随着作者的）首先就是“感觉”而不是理论（观念）；我甚至感到，感性形态的存在是我所做描述的生命。这种“感觉”，就其赖以生成的研究对象而言，本质上是文学的，同时也包括“文学感觉”的形成所需要剥离或所赖以支撑的思想文化现象；当然也需要对这些思想文化现象的形成与表现做必要的学术性追溯与展示，但目的在于突出并强化“感觉”。就我而言，这种“感觉”的形成，首先是在对既有的文学史论质疑的前提下，不带任何成见地去重新阅读那些可以搜集到的史料。就此而言，在我的感觉中期刊比著作更能再现“当年情景”；因而我反复去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等“五四”期刊，是一种生命投入的阅读。在一段时间里，我内心深处确实有一种“回到当年”的感觉，那些“五四”人物一个个地从过去的盖棺论定中走出来。他们在我眼前是“活”的，有血有肉的。我努力去体

验他们，发现并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致对他们的急进、简单、浮泛，甚至“做伪”也感到亲切，同时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其次，这种“感觉”的形成也自然地融会了我二十多年的文学史阅读与研究的体验。正是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历史使我的“感觉”沉重起来，使我感到了它的历史内涵，伴随着某种历史悲凉感——就说北京大学 1918 年发起成立的“进德会”吧，那些道德戒律散发出的“酒色误国”之气，能说与五四新文化绝缘吗？而我们至今对它又有多少实质性的认识呢？周作人等提倡的现代性爱是否具有切入症结的针对性？其“道德救世”那一套为什么历久不衰？显然，这种“感觉”又具有“当下性”：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中是短暂的瞬间，虽然物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的生命形态的表现以至思想情感、思考的问题等，并没有多大变化；就我而言，所以能感受那些“五四”人物，使他们能在我内心深处鲜活起来，并与他们展开一些深层次的“对话”，缘于我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尤其是目前的生存境遇与体验。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五四”近十年的历史似乎在 1978 年以来重新来过，诸如力求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潮的简单、浮泛、驳杂，那种“人”的声音的微弱，迅速消退以至无迹可寻；其中存在着“人”自身的变化，同样也存在着“体制”对“人”的消解。对此，“女师大事件”十分典型，足以透现历史的症结，其中的“陈西滢现象”，那种“做戏的虚无党”之“伪”，以及“用金钱诱惑法术”或“用法术诱惑金钱”；今天较之“五四”，只见其多而不见其少——如鲁迅当年所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

显然，“感觉”在我重读“五四”的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它成为我的写作持续不断的动力，推动着我全身心地投入，带来我写作中的紧张与愉快，使我“释愤抒情”。就此而言，我的书是“写”出来的：这一者是说我并没有“换笔”，我感到那种“笔”尚不足以使我的“感觉”涌现纸面；更主要的，正是在“写”的过程中使我的“感觉”明晰起来，并逐步得到深化；同时也正是因为“跟着感觉走”，使我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着原初构想，矫正着我的认识，使我一次次走出写作“误区”，而回过头来去重新感受“五四”，使那些虽读过却并不经意的“现象”立刻鲜活起来，注入我的笔端而获得生命力。而且，也正是因为与“感觉”相联系，我的“写”重在描述而非论述。比如，对于那些“五四”人物，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人们给予了那么多评说，几乎是用各种理论说破了天，但却使我在“感觉”上觉得并不完全对味，我只能依“感觉”去描述他们，在描述中去辨析他们的异中之“同”，尤其是同中之“异”——当然，这种辨析中融会了理性，但这是由“感觉”孕育的理性，依哲学或心理学所说应该叫“知觉”，但我仍然称之为“感觉”，以保持它的感性形态；因为我深深地感到，那些富于理性的描述失去“感觉”的支撑，将毫无辨析力。

正是这种研究与写作方式，使本书实现了对《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承续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于“科学主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在中国社会的变革语境中“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是双生物”的揭示上。在我的感觉中，这个问题对深化鲁迅研究以至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研究，是极为根本的。我认为，

在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描述中“五四”是缺乏生命力的，即我们常常把“五四”看成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把与“五四”相悖的因素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林纾、严复、辜鸿铭以及《国故》、《甲寅》甚至包括《学衡》的言论（这正是胡适的思路）；且不说这些人的背景与观念十分复杂，就是与他们当时反对“五四”的言论反映出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水准相对应，也只能反过来显现出“五四”倡导者自身变革主张的苍白，而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五四”本有的变革之力。应该把目光进一步伸向“五四”倡导者群体，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变革语境中同样是复杂的存在，包括他们与前述林纾、严复等存在着各自不同的联系——“五四”的生命力更主要是通过倡导者群体自身的“对话”生发出来的。这使我在本书中面对“众声喧哗”的“五四”，不仅辨析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与蔡元培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之异同，而且剥离出在“五四”话语中心存在着“S会馆”的独异之声——其与“刊”和“校”鼎足而立，三者之间尤其是“S会馆”与“一校一刊”相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峙和抗衡的一面；更进一步，又提出“S会馆”本身即呈三角张力，存在着鲁迅与钱玄同尤其是周作人之间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同中之“异”，而这“异”又是一种根本之“异”——由此在“五四”的“众声喧哗”中展示出在“道德主义”、“科学主义”等不同层面上的“多重对话”。

显然，本书之魂在鲁迅，在对鲁迅的重新感受与认识，这较之《鲁迅与浙东文化》更主要表现为超越。《鲁迅与浙东文化》写作历时八年，借鉴并融会了学界中我所敬重的那些朋友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我的研究得到深化。记得当

时钱理群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研究必须超越这种影响；我清楚，本书的写作艰难之处主要在于实现自我超越。我认为，鲁迅研究的薄弱环节或者说研究偏差产生的根源，主要在对鲁迅早期思想认识之不足；而这对于全部鲁迅研究是极为根本的，是我重新认识鲁迅的基点，也是本书所做描述的基点之一。是乐黛云先生的一篇文章《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启示了我，同时也使我坚定了自己的感觉与思考。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之交最足以显现鲁迅之为“鲁迅”的，在“五四”人物中最足以显现鲁迅与其他人的区别和不同的，是他在早期论文中反复提到并作为立论根基的“神思”与“白心”。首先，鲁迅是以“文学家”出现于清末民初，“神思”与“白心”集中体现了他以“文学”改造国民性而见其“思想家”的个性特点；他的文学观是通过对道德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剥离而确立的。其次，直面现实是鲁迅最重要的精神特征，但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确立了“白心”和“神思”的理想，追寻“天性的爱与憎”以改造国民性；这同样有着道德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双重指向，深化着他对“文学”的认识，从而体现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个性特点。由此形成他精神世界中的“梦”与“境遇”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贯穿了他的小说及散文、杂文创作。

而且，本书立足于“感觉”的研究与写作方式的形成，也根源于鲁迅。鲁迅全部创作基于“白心”与“神思”，所显现出的正是他特有的对社会人生及自我的“感觉”方式——这是“现实”的，又融会了丰富的“历史”内涵——我力求在本书

中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对话”方式上的更内在的“契合”。

通过对“多重对话”的展示来深化我的鲁迅研究，目的是要揭示在新文学发生的多元背景下鲁迅作为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与超越者存在的意义。这涉及到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是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时间问题。在本书的描述中充分注意到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大学文化”与“出版文化”的形成之于新文学发生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教育体制较之政体的先行变革，在皇都北京出现了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演变中的学术化取向，北大文科章门弟子同人与桐城学者争论以“六朝文”取代“唐宋文”；另一方面，在以租界为中心形成的新兴都市上海，与文化市场结缘的现代报刊出版业的成熟，相应建立了现代稿酬方式，使自由职业作家得以产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写作传播方式因而具有现代意义，以南社文人为主体的“鸳鸯派”在这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实践。但是，现代教育与现代报刊出版仅仅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部条件，是切合新文学特征而又缺一不可的“外缘”性因素；而且，章门弟子同人与南社文人的文学观虽具有变革意义，却又不具备启动新文学发生的“内缘”因素。如本书所描述，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继超越了清末民初变革思潮的局限，《新青年》发动以语体变革为前导与核心的文学革命，“刊”与“校”达致结合，但仍然没能提供新文学发生的“内缘”根本性因素；这一因素存在于鲁迅那里，因为中国新文学性质所显示的新、旧之不同，不仅仅体现在语体变革即变文言为白话，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于对道德主义

与科学主义的双重剥离之上的，由此形成新文学以立“人”为内涵的审美特质——这一根本性因素萌生于鲁迅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与超越形成的早期思想中，而在“五四”与“一校一刊”包括“S会馆”自身的“多重对话”中获得充分展开。这就是说，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应以清末即1907年为起点，直至“五四”在其内缘性因素与外缘性因素结合的基础上展开的“多重对话”中发生发展的。

本书针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的基础上展示“多重对话”，提出了一系列核心话题，而对众多“五四”人物进行层层深入的辨析与剥离，基点无疑在鲁迅那里：这是建立在我回到现场去触摸历史形成的感觉和在对此的描述中确立的理性判断之上的——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在与中国近现代之交的历史的对应中，几乎惟有鲁迅构成最深层次的“一般”中的“特殊”，他所提供的资源是我们透视那段历史（文学史）的最有力度的依据。所以，近年来学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讨论，就我而言并没有感到这么严重：这一者可能与我的研究始终是“边缘化”的相关，即使在我所置身的那个标榜“鼓励激进，保护叛逆”的小环境中也是如此。更主要的是，这与我研究的对象相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十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以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它具有的开拓性质相关，更主要的原因是由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化带动的。这里涉及到两个在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一者是研究方法上的，可以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来区分；虽然二者在研究中都存在，但有一个主次、先后、轻重之不同的问题。我读过一些“强古人就我”而微言大